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

李宝芳

(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天津 300191)

【内容摘要】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极为重视家庭,认为家庭作为私人领域,应该与公共领域严格分开,妇女是“家庭天使”,职责是让家庭变得舒适甜蜜。这种家庭观念的出现既是这一阶级自身的经济状况、社会处境的反映,也是当时宗教力量、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影响的结果。这种家庭观是当时维多利亚文化的核心内容,对后世也颇有影响。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期 中产阶级 家庭观念
中图分类号 K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2)06-0128-03

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赋予家庭以极高的象征意义和神圣地位,将家庭看作是远离外界的天堂,感情的圣地。“家,甜蜜的家”是这一时期文学艺术中一个延续不断的主题,也是中产阶级的忠实信仰,甚至用“家庭崇拜”一词来形容中产阶级的家庭观念也不为过。

一、家庭观念的内涵与表现

维多利亚时期,家在中产阶级中获得了新的感情重要性。中产阶级认为家是稳定的中心,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圣所。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充斥着杂志、广告、手册和小说。1850年前后,许多以家庭为主要销售对象的杂志和刊物,包括《伦敦日志》、《库克夫人日志》、《家庭格言》和《家庭经济杂志》等先后出现,而且都以“传统家庭之重要性 with 道德观念”为宗旨。“家”一词在诗人、杂志作家和中产阶级之间成了受宠爱的魔术字眼。就如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解释的,家庭生活“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居住方式或者责任网,而是一种深刻的依恋……它的特性是隐私和舒适,与工作场所分离,家庭空间和家庭成员合并为一个威严的概念——家。”虽然喜爱家庭生活并不是中产阶级的发明,但是对家庭生活的强调是全新的,且强调的程度前所未有的,而且家庭生活被极大地理想化了。“家,温馨甜蜜的家”是中产阶级恪守的信条,是他们的座右铭。

中产阶级信奉家庭的私人世界与外面商业和政治的公众世界严格分离,公私世界不仅空间分离,而且在价值观上也是对立的。家庭被赋予崇高的道德和精神力量,象征着舒适、安宁、爱与和平,被理想化为道德世界的中心。它的价值观与外面世界崇尚竞争、理性、自私自利的价值观相对。家,尤其对中产阶级男人来说,是他的城堡,是他快乐、悲伤和冥想的圣地,是幸福的唯一来源。当时英国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也认为:家的真正的本质——它是和平之所,是避难所,不仅可避免伤害,而且可

避免恐惧、猜忌和分裂。对在外面世界工作打拼的中产阶级男人来说,他总是将工作与家庭生活严格分开。只有在家里,他才真正的是他自己,才真正地过自然和真诚的生活。这在威廉姆·黑尔·怀特的自传小说中有明确的表达:“我在办公室里的生活与在家中的生活完全分离,我有两个自己,我真正的自己不与另一个自己接触而被污染。一想到时钟敲七下时,我的第二个自己死去了,而我第一个自己和它毫无关系而毫发未伤……我是一个公民,走在伦敦的街道上;我对人类和知识有自己的观点,我和我的朋友平起平坐,我是艾伦的丈夫,简单地说,我是一个男人”^[1]。

“甜蜜的家”之观念的内涵中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家庭天使”观。“家庭天使”观认为女性应该柔弱、纯洁、善良、优雅,是家庭的天使。当时大多数人都接受拉斯金关于女人与家庭的观点,即: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妇女的工程,一种鼓励的舒适的氛围来保护丈夫和孩子免受世界的严酷。“一个真正的妻子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家庭天使”的特点是完全休闲的、装饰性的、被动的、文雅的、完全无助的和依赖性的。工业革命使中产阶级家庭的生产经营场所与生活场所分离,家庭不再是工作的场所,它的生产功能已让位于工厂。过去曾经是男性得力助手的妻子和女儿,如今却不稼不穡,在家闲居。她们被认为从公共领域的经济活动中剥离出来,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领域。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以家庭生活为中心的时代,和谐向上的家庭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核心之一。公共生活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分离,贤妻良母型的“家庭天使”和温和的家庭亲子关系是中产阶级推崇的理想家庭形式。具体而言,“家庭天使”观念的内涵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持家理想。妇女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责任是管理秩序良好的舒适的和平圣殿——家庭,料理家务,保持房子整洁舒适,能够计算家庭开支,进行家庭预算,管理与教导仆人,要对所有家庭成员的外表负责,要承担拜访的社交责

* 作者简介 李宝芳(1980—),女,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任。其二,道德理想。英国人在道德层面对家的期许也延伸到对女性的期许。他们认为妇女应该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严守贞洁,相夫教子,是丈夫和孩子学习的道德典范。维护家人的道德品质和精神面貌是妻子的重要职责。其三,生育理想。即生育子女,抚养后代。女人最主要的职责是成为贤妻良母,抚养、照顾和教育子女。女性主义学家马莎·维奇诺斯曾表示:家庭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基石,而最完美的女性的任务不外乎结婚和生子。

中产阶级文化鼓励它的男成员把为家人谋福祉视为追求物质成就的主要动力。有一个舒适安乐的家庭,有能力供养妻小不出去工作是当时中产阶级男人成功的标志和身份的象征,是他们追求的理想目标。家庭成为中产阶级身份和自我定义的重要方面,成为构建中产阶级男性气质的关键因素。他们竭力营造“家庭幸福,孩子知恩,无债不愁,中庸为本”的和谐理想的家庭生活。

二、家庭观念形成的背景因素

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这种家庭观念前所未有的,是多种因素推动的结果。

(一)工业化带来的工作与家庭日益分离是影响中产阶级家庭观念和家庭生活的关键因素。维多利亚时期,中产阶级家庭渐渐失去了生产性职能,精神和情感功能却得到强化,也就是说,家庭功能的重心在发生转移。正是由于家庭与社会相分离、家庭与工作相分离,所以,家庭成为更加私人化、隐秘性的生活领域,家庭成员在情感上相互支持的作用更为重要,在心理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更高。中产阶级妇女也渐渐退居家中,相夫教子,承担起“家庭天使”的职责,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功能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帕森斯就认为现代核心家庭有必要满足工业社会中的四个基本需要:规范性行为,再生产下一代,抚育孩子和将其社会化符合社会价值的人,给成年人提供心理支持。给成年人提供心理支持,就是说家庭所具有的精神和道德的支持功能。而再生产下一代,抚育孩子和将其社会化符合社会价值的人等家庭功能就是对中产阶级女性要充当“家庭天使”的要求。

(二)这种家庭观念也是中产阶级对所处社会环境和现实经验的一种反应,是对商业资本主义破坏人际关系的一种反应。按照帕森斯的观点,家庭的基本特点是均衡,家庭结构的稳定性是不言而喻的,其主要功能在于重新确立被外部世界破坏的和谐均衡状态。中产阶级家庭正是作为对抗外界的宁静港湾而起到了维持心理平衡的作用。维多利亚时期是英国社会不安和变革的时代,这给中产阶级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让他们充满焦虑。他们需要在这个变革的世界里寻找一方净土以休养生息,无疑,家庭因其血缘与情感的特质而凸显其重要性。中产阶级极力宣扬家的神圣地位,恰恰反映了当时家庭在急剧变革的社会里遭受破坏的情形。工业化带来的工厂制、妇女和儿童的家外就业影响了家庭尤其是工人阶级家庭的稳定,引起了人们对传统家庭道德失落的忧虑与担心。中产阶级为维持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需要从稳定家庭开始,提高家的神圣地位。

(三)中产阶级家庭观念的出现也有现实的物质条件做支撑。维多利亚时期,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也在改变传统的

家庭生活。工业化家庭提供了新型装饰和其运行所需的技术、通讯和交通等条件。中产阶级有了更多可支配的收入,可以购买新的家具、设备,饮食、居住条件都获得改善,卫生标准提高,一切都井井有条且干净整洁,这些都使家变得更为舒适,从而也更具吸引力。新的家庭建筑布局有专门给孩子的房间,给妇女做针线的房间,给男人活动所用包括图书室和学习室的房间,旨在服务于不同家庭成员的专门活动,也适应了新的家庭生活方式。由于环境卫生和健康改善,儿童死亡率下降,人均寿命延长,许多父母可以活着看见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浪漫主义关于无知的信仰推动了童年的理想观,创造了被称为“儿童崇拜”的观念,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观日渐发展。人们把更多的感情投入到家庭生活,家庭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总而言之,中产阶级“甜蜜家庭”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既是这一阶级自身的经济状况、社会处境的反映,也是当时宗教力量、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社会背景影响的结果。对家庭推崇备至、喜爱家庭生活的观念在中产阶级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成为这一阶级的主导价值观。中产阶级家庭道德观念是构建中产阶级身份、文化的重要因素。

三、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观念与维多利亚文化

随着中产阶级的日益发展壮大,他们价值观的影响也日渐广泛。所以对整个维多利亚社会而言,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观念同样举足轻重。维多利亚时期,宣传家庭观念读物的主要销售对象虽然是一些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妇女,但是它们的影响力却不为此所限。这是因为阅读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休闲娱乐,妇女在购买刊物后通常都会在茶余饭后拿出来和家人一起阅读里面的文章;而当中一些道德观念较重的章节,甚至可以用来对仆人训话之用。这些刊物的内容也因此而得以向社会各阶层传播开去。而且中产阶级也竭力向其他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灌输和传播这种家庭观念,所以他们的家庭观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人普遍认同。狭义的维多利亚文化主要指维多利亚道德,其含义是正义和圣洁,与中产阶级家庭道德观念中纯洁正义的意象不谋而合。其核心是约束人们的道德规范,认为道德准绳应置于对行乐和权力的追求之上。这种道德规范内容之一就是让人们重视婚姻家庭,将家庭作为维持道德规范的重要场所。家庭,是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的基石。吉·基·切斯特顿曾说“英国人的家庭就是他的城堡”,他还写道:也就是从这一代人开始,“要求孩子们去崇拜不设祭坛的壁炉”^[2]。维多利亚文化就是以这种家庭观念为基础架构的,要求人们重视神圣的婚姻和美好的家庭。中产阶级的家庭道德观念可以说是维多利亚文化的中心和标签。一篇曾刊于《家庭经济杂志》的文章就指出:大英帝国是一个以家为首的国度。国人对于保护家的温暖是认真和全力以赴的……因为家仍是一切之源。没有了家,大英帝国也不可能荣华^[3]。“家,甜蜜的家”几乎变成了英国人的第二国歌。到1900年的时候,对数百万各个阶层的人来说,家庭和家族就是生活的一切。“家庭”这个观念,不仅影响了当时人们对事物的反应及展现的品味,更代表了道德观和原则,并为之提供了直接的英国文化身份认知的基础。现代评论家狄德拉·戴(下转第139页)

为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的终极关怀,随着人类的发展,文化的价值一定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文化的一切价值,包括直接导源于人的自然性的生存、安全,和直接导源于人的社会性的秩序、平等、公正,等等,以及自由、人权、法治等都无法脱离人的意识性。它们都是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人的自然性、社会性与意识性共同构成了人的属性。其三者的统一,为文化的产生奠定了人性基础。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性恶论和性善论都是唯心主义。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西方国家之所以选择性恶论的思想和西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历史和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同时,建立在人性恶基础之上的制度文化客观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民主政治的确定。但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这有利于个人主体性的弘扬、个性的解放,有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但其极端发展也使现代西方出现了诸多问题,使个人都变成孤独离散的个体,丧失了普遍价值和理想,使社会关系松散,人际冲突增多,社会安全没有保障,社会失去稳定。也是造成当今世界社会危机的根源。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善的认识,作为一种追求至善的文化,其社会目标就在于引导人类向善,避免因人性放纵而引发社会混乱。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加强民族的亲和力。但这种观念又易忽视个人权利,否定个人自由,把人束缚在等级隶属关系之中,影响了个性的解放、个人

自主性的发挥。对此做谁优谁劣的简单整体评价是没有必要的,也是没有可比性的。重要的是坚持多元并存、取长补短、中西整合、综合创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 21 世纪的文化时,必须坚持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义利统一,德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统一,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与文化反省革新意识的统一。

同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人性具有双重性,即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在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应认识到人性善的一面,通过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从而弘扬人性之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诚信文化。而在建设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制度文化过程中我们更应清楚地认识到人性恶的一面,权力具有自腐性、膨胀性的事实。我们应该坚定地假设人性恶。这应该是我们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对人性问题最基本的观念。

参考文献:

- [1]傅吉元著.人性缺陷与文化控制:现代危机根源探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11.
- [2][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本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 [3]田真著.世界三大宗教与中国文化[M].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
- [4]龙宗智著.上帝怎样审判[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 [5]徐爱国等著.西方法律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上接第 129 页)维就指出,只要看维多利亚女皇利用不同的宣传手法,在人民心目中所刻意树立起的“国母”形象,便可知一二。当时的英国社会结构,其实就形同一个以女皇为一家之首的“大家庭”,所要维系的正是“家”这个观念在英国人心目中所象征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也足以反映出“家”在当时英国足以支撑整个社会架构和文化观念的重要地位。维多利亚社会宣扬男女有别、尊卑有序,讲究礼仪与秩序。性别与狭义的维多利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于当时英国人将男主外、女主内的互动关系视为构成和谐家庭的根源,一旦男女的界限模糊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关系也会跟着混淆,导致以往和谐的家庭遭致破裂,从而影响对整个英国文化身份架构的理解。在西方家庭从主要以经济为基

础向以感情为基础转变的漫长过程中,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家庭生活代表了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后世对家庭许多方面的理解都是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创造。

参考文献:

- [1]Catherine M. Maclean. Mark Rutherford: a Biography of William Hale White[Z]. London, 1955:150-151, quoted from John Tosh. A Man's Place: Masculinity and the Middle-class Home in Victorian England.
- [2][英]阿萨·勃里格斯,陈叔平,刘城等译.英国社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295.
- [3]Raymond Williams. Woman in Domestic Life[J].Magazine of Domestic Economy,1 (1836):66.